

出版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曾永義  
主編

# 輯刊 研究 文學 古典

三編 第8冊

## 宋濂的道學與文論

謝玉玲 著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 編

曾 永 義 主編

第 8 冊

宋濂的道學與文論

謝 玉 玲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宋濂的道學與文論／謝玉玲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民100〕

目 4+344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三編；第8冊)

ISBN：978-986-254-550-8 (精裝)

1. (明) 宋濂 2. 學術思想 3. 理學 4. 文學評論

820.8

100015000

ISBN-978-986-254-550-8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三 編 第 八 冊

ISBN：978-986-254-550-8

## 宋濂的道學與文論

作 者 謝玉玲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mailto: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1 年 9 月

定 價 三編 30 冊 (精裝) 新台幣 4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 宋濂的道學與文論

謝玉玲 著

## 作者簡介

謝玉玲，臺灣苗栗人，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現為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著有《空間與意象的交融——海洋文學研究論述》、《土地與生活的交響詩——臺灣地區客語聯章體歌謠研究》，主編《臺灣現代海洋文選》，以及〈儒教聖殿的無盡追尋 論《野叟曝言》中的排佛書寫〉、〈宋濂之傳記文探析——以《浦陽人物記》為考察重心〉、〈宋濂詩歌中的人物形塑〉等學術論文數篇。主要研究方向為元明清文學、海洋文學、客家文學，尤重於空間意象、敘事類型等課題之研究。

## 提 要

宋濂（1310～1381）被譽為明朝「開國文臣之首」，其前半生在元朝渡過，五十歲正式仕明，宋濂經歷這種世變的過程，其詩文大多脫去元末纖穠浮豔之習，對當代文風影響甚鉅。在學術的演進過程中，就狹義層面而言，如從思想與文學層次觀之，「變」可說是一種直線對應式的完成，即上有所承到下開新局，其中亦有橫向的變與不變之間標準的衡量。若從廣義層面來看，朝代的更迭是「變」，在歷史與時間的座標上，可視為影響價值觀轉化的重要推手，同時亦可作為文化層面的一種檢視，尤其是知識分子如何看待政治變局，進而反省世情變遷對個人主體安身立命分際之掌握與影響。宋濂因身處在元明易代之際這種特殊的世變時空環境，因此知識分子的生命體驗與傳統文化價值產生的互動，就顯得格外有意義。

本篇論文以宋濂為研究對象，並以《宋濂全集》與相關宋濂作品為研究範圍，以「道學」和「文論」為兩個重要的軸心，歷代學者對此「文」與「道」之間的互涉關係有相當多的討論，在此範疇中，本文的研究重心試圖透過對宋濂道學思想的釐清與文學理路的梳理，證明宋濂在其屢言不朽之文背後價值觀「道」的確立，同時文章意義與價值不僅僅屬於文學層次的論述，更是立身處世的標準，因而吾等可進以深究其中曲折深處的思想轉折與變化。雖然許多文學史對明代初期的文章發展評價不高，然筆者以為，對於被視為足以轉變當代學術風氣的指標型學者而言，給予適當詳實的評價與定位，有其必要性，明初的宋濂即是如此。

因此本篇論文從敘述釐析宋濂的生平事蹟，元末明初之際師友互動的情況，以及時代環境對其所造成的影響為出發，進而探究宋濂的道學思想特質與浙東學術發展的關係脈絡，希望藉此尋得宋濂思想的特質，並作為探究他文學理路發展的根據。其次是探討宋濂文論的內涵架構與法則，並透過宋濂個人對詩文作品鑑賞的態度和法則，檢視宋濂的道學如何影響其文論的建立。同時透過分析宋濂的詩文作品，驗證其理論，若合乎道才取之為用，將如何落實在實際的創作層面上？同時道學與文學究竟如何交流？嘗試為宋濂在思想與文學的互動層面上，找尋一個較為適切的位置。



# 目次

|                          |    |
|--------------------------|----|
| 第一章 緒 論                  | 1  |
| 第一節 研究旨趣                 | 1  |
| 第二節 文獻探討                 | 5  |
| 一、前人對宋濂的評論               | 5  |
| (一) 對宋濂生平行事的評論           | 6  |
| (二) 對宋濂文章學術的評論           | 12 |
| (三) 對宋濂是否佞佛的討論           | 21 |
| 二、當代學者的研究成果              | 23 |
|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 30 |
| 第二章 宋濂的生平事蹟              | 39 |
| 第一節 生平傳略                 | 40 |
| 一、家世生平                   | 40 |
| 附表一：宋濂世系圖                | 44 |
| 二、時代環境                   | 44 |
| 附表二：《元史·列女傳》中之殉節烈婦<br>舉隅 | 53 |
| 第二節 學術淵源與治學態度            | 54 |
| 一、轉益多師                   | 54 |
| (一) 師事於聞人夢吉              | 55 |
| (二) 受業於吳萊                | 57 |
| (三) 從學於柳貫、黃潛             | 60 |

|                   |     |
|-------------------|-----|
| (四) 其他            | 66  |
| 二、浙東先哲之濡染         | 68  |
| 三、學友相互砥志勵學        | 70  |
| 四、參取六藝而知類通方       | 72  |
| 第三節 仕隱抉擇          | 77  |
| 一、宋濂對士人出處抉擇的原則    | 78  |
| 二、宋濂對士人出處抉擇的要件    | 87  |
| 三、宋濂對士人面對人生的多元選擇  | 94  |
| 第三章 宋濂道學思想析論      | 101 |
| 第一節 天道與人道的省思      | 104 |
| 一、自然的天道觀          | 106 |
| (一) 道之自然無爲        | 106 |
| (二) 萬物的生成化育       | 109 |
| (三) 效法自然以弘道       | 112 |
| 二、心的作用與價值         | 116 |
| (一) 心是萬理之原、至虛至靈   | 117 |
| (二) 吾心與天地同大       | 119 |
| (三) 對心性觀念的發揮      | 122 |
| 三、天人關係            | 131 |
| (一) 宋濂的天人觀        | 132 |
| (二) 對祿命的看法        | 138 |
| 第二節 理想人格的建構與追尋    | 142 |
| 一、對「道統」的簡擇與體悟     | 143 |
| (一) 道統與學統         | 143 |
| (二) 道統與治統         | 153 |
| 二、「理想人格」的範型及成聖之途徑 | 158 |
| 第三節 經史意識的審視       | 169 |
| 一、宋濂的經史思維         | 170 |
| (一) 六經皆心學         | 170 |
| (二) 經史不二          | 175 |
| 二、宋濂的史學表現         | 178 |
| 第四節 對釋道的取捨        | 180 |
| 一、出入釋教，以儒爲本       | 183 |
| (一) 儒釋一貫          | 184 |
| (二) 援佛入儒的明心識心之法   | 190 |

|                           |     |
|---------------------------|-----|
| (三) 宋濂對佛教的相關論述            | 194 |
| 二、調和儒道，相互為用               | 198 |
| (一) 對道家、道教觀念的會通           | 199 |
| (二) 對道家、道教取捨的準則           | 201 |
| 第四章 宋濂文論的內涵建構             | 205 |
| 第一節 宋濂文論闡示的文道規律           | 210 |
| 一、「文」的辨析                  | 211 |
| (一)「文」的定義與範疇              | 211 |
| (二) 文的價值作用                | 218 |
| 二、文學本源——明道與宗經             | 222 |
| 第二節 氣文互為表裡的文論旨趣           | 232 |
| 一、從養氣到文氣——氣與文的貫通          | 232 |
| 二、隨人著形，氣充言雄——人格與文格的<br>聯繫 | 238 |
| 三、從山林到臺閣——環境對文氣的影響        | 245 |
| 第三節 文章創作之法則               | 253 |
| 一、五經為本，史漢為波瀾              | 253 |
| 二、師古必師心                   | 254 |
| 三、文主通變                    | 261 |
| 第五章 宋濂文論之具體表現             | 267 |
| 第一節 詩文鑑賞的態度與方法            | 268 |
| 一、鑑賞的態度                   | 268 |
| 二、品評的標準與方法                | 271 |
| (一) 明道宗經與知人論世的深化          | 271 |
| (二)「五美云備」的品評方式            | 273 |
| 第二節 對漢代以來的詩文評騭            | 282 |
| 一、以宋文為尊                   | 283 |
| 二、詩宗盛唐，尚風雅比興之美            | 293 |
| 第三節 宋濂的詩文成就               | 300 |
| 一、宋濂的散文特色                 | 301 |
| 二、宋濂的詩歌特色                 | 305 |
| 第六章 結 論                   | 313 |
| 附錄 宋濂作品繫年簡表               | 323 |
| 參考書目                      | 333 |

# 第一章 緒 論

## 第一節 研究旨趣

宋濂（1310～1381）被譽為明朝「開國文臣之首」（《明史·宋濂傳》），學者尊稱為「有明一代文章之冠冕」（《浦陽人物記·胡鳳丹序》）、「有明三百年文章鼻祖」（《宋學士未刻稿二卷·陳國珍序》），《明史·文苑傳序》亦云：「明初文學之士，承元季虞、柳、黃、吳之後，師友講貫，學有本原。宋濂、王禕、方孝孺以文雄。」對有明一代的文壇而言，宋濂實具有特殊崇高的代表意義。然而長期以來，人們對於宋濂的認識往往限於其為明初文章大家，相形之下，宋濂在學術上的表現就較為人所忽略。事實上，宋濂並不承認自己僅是一個「文人」，他曾說：

生好著文，或以文人稱之，則又輒然怒曰：「吾文人乎哉？天地之理欲窮之而未盡也，聖賢之道欲凝之而未成也，吾文人乎哉？」〈白牛生傳〉〔註1〕

對他而言更大的意義在於聖人之道的追尋與實踐，〔註2〕因此從上述引文之言

〔註1〕《全集》，頁80。《宋濂全集》（羅月霞主編，全四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是目前收集宋濂詩文篇章數量最為豐富的版本，也是第一部點校本，因此本論文在研究過程中將以《宋濂全集》收羅之宋濂詩文為主要研究資料，並配合目前可見之宋濂文集版本加以參照，如無出入，引文時則簡稱《全集》，並標注《全集》之頁數，以下不贅。

〔註2〕黃百家在《宋元學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學案·文憲宋潛溪先生濂》之按語肯定宋濂在學術思想方面的表現，故云：「道之不亡，猶幸有斯。」。〔清〕黃宗羲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

中，除可見其志趣所在之外，宋濂本人對時人稱頌其文章雖頗不以爲然。若根據諸多文章中的陳述，「明道」、「宗經」與「重文」三者實爲其畢生秉持的學術原則，甚至可說是個人的立身準則與價值標準。況且若從「文化」的角度觀察，宋濂並不是個陋儒，透過傳統經典的養成教育，他不僅廣泛熟悉儒家典籍，舉凡歷史、諸子、文學、藝術，甚至是經濟民生與佛教內典，皆能重視並加以研究，絕不是緊抱著儒家經典而不知權變，因此其文學思想亦較爲駁雜。

宋濂早年受業於聞人夢吉，「復往吳萊學已，游柳貫、黃潛之門」《明史·本傳》，而吳萊、黃潛、柳貫皆屬元代金華學派重要傳承者，所以宋濂實上承元季金華儒學的道統與文統。但是金華儒者的特徵亦在於身兼二重角色，一爲理學家，一爲文學家，既重道又重文，也重事功，與程朱理學並不全然相同，因此宋濂在思想上也呈現出多元與實用的特質，面對宋濂思想中文與道關係的掌握也相對複雜起來。由於宋濂的學養實兼具金華學派與浙東學派的特質，因此多角度釐清宋濂的思想脈絡，對理解其個人以及他在明初所扮演的角色與地位，就益發顯其重要性。宋濂前半生（以四十九歲爲分野）在元朝度過，五十歲正式仕明，他經歷這種世變的過程，詩文大多脫去元末纖穠浮豔之習，對當代文風影響甚鉅。全祖望將宋濂歸入「婺中之學」，並將其視爲該學派明初的傳人。<sup>〔註3〕</sup>但是朱學與金華學術並不同，因此似乎並不能把宋濂的思想僅僅侷限於某一學派的延續而已，我們應深入分析宋濂的觀點，從其文論主張與文章實踐的表現一窺其在元末明初文壇所具備的歷史意義。

「學足以明道，文足以垂世」，<sup>〔註4〕</sup>可說是明初學術代表人物宋濂畢生志業的最佳註腳。對「文」與「道」之間聯繫的探究，是歷代學者眾所關心的議題，曹丕早在《典論·論文》中即云：「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

局，1986年，頁2801。

〔註3〕 全祖望在《宋元學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學案·宋文憲公畫像記》言：「予嘗謂婺中之學，至白雲而所求於道者疑若稍淺；觀其所著，漸流於章句訓詁，未有深造自得之語，視仁山遠遜之，婺中學統一變也。義烏諸公師之，遂成文章之士，則再變也。至公而漸流於佞佛者流，則三變也。猶幸方文正公爲公高第，一振而有光於西河，幾幾乎可以復振徽公之緒。惜以凶終，未見其止，而并不得其傳。」

〔註4〕 見《明太祖賜國子司業語文》，頁2281。

自傳於後。……」因此對不朽之文的追求，便成為學者的信念與努力的目標。自劉勰於《文心雕龍·原道》提出「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周敦頤提出「文以載道」的觀點，之後宋明理學家甚至極端地提出文學無用的說法，〔註5〕可見歷代學者對此範疇所提出的論點，除了代表著不朽之文背後價值觀「道」的確立外，文章意義與價值，不僅僅屬於文學層次的論述，更是立身處世的標準，因此「文」「道」的離合，實應視為兩個層次，而吾等可進以深究其中曲折深處的思想轉折與變化。

「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文心雕龍·時序》），在學術的演進過程中，「變」具有多重意義。就狹義層面而言，如從思想與文學層次觀之，「變」可說是一種直線對應式的完成，即上有所承到下開新局，其中亦有橫向的變與不變之間標準的衡量。若從廣義層面來看，朝代的更迭是「變」，在歷史與時間的座標上，可視為影響價值觀轉化的重要推手，同時亦可作為文化層面的一種檢視，尤其是知識分子如何看待政治變局，進而反省世情變遷對個人主體安身立命分際之掌握與影響，如此一來知識分子的生命體驗與傳統文化價值，在特殊的世變時空環境中所產生的互動，就顯得格外有意義。

中國傳統文人兼具多重身分，除了文學家外，多半也是思想家。在學者思辨的過程中，以儒家思想做為核心價值，其對文學的看法或理論的提出，不一定如同西方文論具備縝密完備的架構體系，但必有一套思維邏輯，積極提供學者論述背後的重要依據，同時透過書寫過程，體現包括內在行為規範與外在社會政治責任。因此透過學者在不同世代的論述，「文」與「道」孰重孰輕乍看之下雖是個別看法，但往往又與整個時代環境、學術脈動息息相關，

〔註5〕例如程頤對於文學是較為輕視的，其云：「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云：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非俳優而何？」《二程遺書》卷十八。關於宋明理學家的文學觀，目前評論者多半仍認為他們對於文學採較為偏執的觀點，抹煞了文學的價值。如周勛初在《中國文學批評小史》中的說法是：「（道學家）宣揚儒家學說，結合宋代政治上的需要，強調建立封建正統的世界觀。他們也論及文學問題，但其結論只是一筆抹煞。」參見周勛初：《中國文學批評小史》，高雄：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頁124。王運熙、顧易生則從理學家著重個人德行修養角度提出說法：「（理學家）的文論有明顯的重道輕文，以致抹煞文的傾向，然從修身養性的角度出發，對文學的涵養德行、陶冶性情的功能仍然是重視的。」參見王運熙、顧易生主編：《中國文學批評通史（宋金元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747。

甚至是彼此結合貫通，在不同階段具備不同的歷史意義和價值作用。

身處易代之際，人物與時代更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宋濂在入明後除了擔任文誥起草外，另外也主持幾部重要典冊的編修，例如《元史》、《大明日曆》、《皇明寶訓》，參與議禮典章制度的建立如《孝慈錄》，並擔任太子贊善大夫，擔負教育皇太子朱標的責任。此外相對於其他開國儒士，宋濂尚於致仕前一年洪武九年（1376）六月，由翰林侍講學士升任「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贊善如故」，〔註 6〕可見其地位之重要與明太祖的賞識。明初文士對於朱元璋政權的建立也產生一種穩定的作用，其中宋濂、劉基等人是當中重要的核心人物，明初朱元璋於開國時重用文士，若從政治的角度進行觀察，相較於開國功臣武將多半陸續在立國後幾年遭明太祖猜忌與殺戮，文士雖位階不高，卻備受重視。此時無論是思想、政治、社會、經濟民生等諸多方面，都處於需要重新建立規範的階段，因此明初的文士一方面雖較可發揮所長，一方面在行事上卻也需要謹慎地面對明太祖，故經常處在一種充滿危機且須面對各種衝突的選擇點上，或居高位或退隱山林，不得不作出抉擇的一種尷尬局面。因此元末明初的士人，其仕或隱的選擇，就變成當代學者論述中的一個重要議題，宋濂與他的學友面對這種情況，自然也無法從中豁免。然而這種抉擇的背後根據，還是得回頭追尋宋濂畢生秉持的理念，其如何在這種政治環境中期待有所作為，並希冀進一步在施政行事方面影響明太祖，以儒家的仁義道德治天下。自先秦以降，儒家思想中「內聖外王」終極志業的理想深刻影響宋濂，這種理念在《龍門子凝道記》〔註 7〕中屢屢展現其積極用世的理想，他也不斷在文章中提到其所重視之「文有大用」、「有用之學」，再如「作文當有關世教」、「自道學不明，學者纏蔽，傳注支離之習，不復見諸實用。」等言論，可知宋濂心中不僅要承續儒家學術，在立身處世上對自己也有一番期許，因此從〈文原〉等篇章中實可見宋濂力主義理、事功、文辭三者的統一。

至於在其纂修的《元史》、《浦陽人物記》〔註 8〕中，除了呈現浙東史學的特點外，我們可從中觀察宋濂基於儒家思想的價值判斷，所展現出理想人格的表現。宋濂仕明十九年，我們看到他位居文官高位「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

〔註 6〕 《明實錄·太祖實錄》卷 106。

〔註 7〕 《全集》，頁 1753～1815。

〔註 8〕 《全集》，頁 1819～1852。

太子贊善」，在政治上並無明顯實質的發揮。以宋濂如此明經重道尚經世致用者，應是有所爲有所不爲的，且當是時如危素的直言進諫上萬言書，或是如同好友王禕出使雲南，都是一種積極用世的表現，但宋濂似乎令人感受到他的矛盾，是能力不足？〔註 9〕還是明哲保身，等待機會？也或許這個位置宋濂認爲可以一展長才。透過這個角度的追尋，我們更能夠深入追尋宋濂的心志，不僅限於幾個如學派延續、仕隱爭議、台閣山林之文孰優孰劣的問題，應該更全面掌握宋濂思想理路，觀察其是否實踐他的理念，如何具體操作，並進而展現其影響性。本文將宋濂作爲討論的對象，對宋濂文論與道學關係進行系統性的研究，並嘗試給予合理的評價。因此面對成說或意見，仍需透過資料梳理的程序與驗證，使遮蔽的狀況得以顯現，存疑的問題得到確認或者是批評。

## 第二節 文獻探討

近代學者對明初文士的研究，業已注意他們在文學或是理學方面的影響，但往往總是點到爲止，在評論時則多從個人尺度及當代社會情境去衡量，容易造成過度褒揚或是有意貶抑的狀況。前人對於宋濂的研究與評論多屬於簡短的評論式資料，至於當代學者的研究，大體而言全面且系統性的論述並不多見，多屬於主題式的單篇論述，如針對宋濂的某一角度進行討論，或者是在探究明代文學思想時附帶提及，儘管如此，這些研究成果對我們進行宋濂研究仍有相當大的助益。相對於宋濂個人文集這種史實性的資料，歷代研究者評論性質的成果除了保有評論批評意見之外，經過時間的積累，也逐漸轉化成新的史實性資料，重要性並不亞於文獻本身，因此在不同學者的理解與論述中，可以刺激我們多面向的思考，有助我們能夠更小心謹慎的解讀文本與對文獻進行詮釋。以下將概略回顧歷代學者對於宋濂研究的相關成果，並進行簡單的評介。

### 一、前人對宋濂的評論

明清兩代對於宋濂的討論，主要有幾個討論的議題，包括針對宋濂生平

〔註 9〕 關於此點，明太祖在〈翰林承旨宋濂誥〉中曾論及宋濂的處事能力：「爾濂雖博通今古，惜乎臨事無爲，每事牽制弗決，若使爾檢閱則有餘，用之於施行則甚有不足。」此文收入錢伯城、魏同賢、馬樟根主編：《全明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頁 30。

行事的討論、宋濂的文章與學術以及是否「佞佛」等，其中多數是讚揚意見，也偶有負面評價。

### （一）對宋濂生平行事的評論

明代文士對於宋濂個人的遭遇，多從其行事風格進行討論，此種論述焦點著重在宋濂入明朝為官二十餘年，卻因子孫之故捲入胡惟庸案，最後在流放途中客死異鄉這種人生遭遇，進行多角度的評論。

宋濂身處元明之際，四十九歲入明，受到明太祖的賞識，也曾擔任起居注、翰林侍講、太子贊善大夫等重要的文職，但一直到致仕，皆侷限於宮廷之內，並未實際外派或是擔任具有政治實權的官職。從入仕明朝到致仕返家，皆兢兢業業地做事，也非常謹慎真誠地與明太祖互動，卻在晚年因為長孫宋慎、次子宋璉捲入胡惟庸案，面臨被處死的命運，後因馬皇后與太子朱標極力求情，才得以流放茂州，而在路途中死於夔州客居之所。

由於宋濂在明代並沒有進入所謂的政治決策核心，與其文章中欲有所作為的急切表現，其中似乎有所落差。關於此點，明太祖曾指出宋濂的問題在於：

昔君天下者，官有德而賞有功，世之文武莫不雲從。爾濂雖博通今古，惜乎臨事無為，每事牽制弗決，若使爾檢閱則有餘，用之於施行政則甚有不足。然方今儒者，以文如卿者少，朕念卿相從久矣，特授翰林學士承旨。爾宜懋哉！洪武九年。〈翰林承旨宋濂誥〉〔註10〕

此段言論是明太祖對宋濂處事能力較直接的評價。宋濂雖然學問淵博，但面對問題時容易遲疑，執行能力也不夠，只適合做文臣檢閱的工作，但又因為明太祖本身對他的文采極為賞識，故從「朕念卿相從久矣」一句，也可得知太祖長期對宋濂行事實有所觀察。綜合明太祖之言，可見當時授與宋濂「翰林學士承旨」一職是適得其所。在〈明太祖賜翰林承旨誥文〉中也有一段褒貶兼備的言論：

三皇五帝之馭天下，其文武之能，君臣皆備而善焉。至於三代之臨御，禮、樂、射、御、書、數，君臣尤精。繼至秦漢以來，人不知古有文武史分，各為之圖，故聖賢鮮矣。朕出自草萊，非兼備之才，蒙上天授命，位極兩間。凡生民休息，百神祀事，盡賴文武輔導以成之，是致鬼神享而軍民安又九年矣。然文者，翰林院尚未有首臣。

〔註10〕同註9。

朕於群儒中選，皆非真儒，人各需名而已。獨宋濂一人侍朕左右十有九年，雖才不兼文武，博通經史，文理幽深，可以黼黻肇造之規，宜堪承旨，弘燦明文，壯朕興王，特敕爾中書，奉行毋滯。洪武九年○月○日。

根據二人長時間的互動與誥文的紀錄，明太祖對宋濂的個性與能力非常了解，雖然認為其「臨事無為，每事牽制弗決」，但亦肯定他是「真儒」，並非只是為追求虛名的士人而已，雖然宋濂只屬於文士之才，但亦具備國家文臣典範的表現。若換個角度從宋濂的立場觀之，其身為臣屬，面對明太祖如此的賞識，自然也是感念在心。因此明太祖的誥文或可對宋濂未曾真正在官場上擁有實質的地位與權力，提供了另一個屬於文士本身個性問題的角度做思考。

明代袁袞對宋濂抱持肯定的態度：

傳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高皇帝下金陵，定括蒼，首聘四子，此亦巖渭弓旌之遇也。宋公雖白首侍從，無封侯之業，優遊禁近，非堯舜之道，不陳于王前。其所奏對，諷而不失，輒見採納。觀其始見高皇帝聞取天下大計，即以不殺為對，此豈小儒曲學，瑣瑣富強者能之哉？卒能以其所學，潤色洪業，使我明之禮樂，煥乎與三代同風，區區叔孫桓榮之徒，不足數矣。〔註11〕

袁袞對入明之後宋濂的表現極為讚許，其從宋濂身為太子帝師角度論之，雖無封侯之事功，但卻能發揮文士之作用，利用機會向皇帝進陳堯舜先王之道，並能適時提供治天下意見，尤其是「不殺」之建議，對明朝建國之初政治的穩定實有助益。

雖然宋濂與明太祖的互動尚佳，然而明初文士卻必須面對明太祖多疑的個性和極權殘暴的手段，〔註12〕因此有明一代學者對於宋濂的一生，尤其是

〔註11〕〔明〕談遷著／張宗祥點校：《國權》，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二次印刷，頁603。

〔註12〕在《明史·宋濂傳》中有一段史實，可說明明太祖的猜忌與多疑：「嘗與客飲，帝密使人偵視，翌日問濂昨飲酒否，坐客為誰，饌何物，濂具以實對。笑曰：『誠然，卿不朕欺。』」針對明太祖個性猜疑與極權殘暴，學者相關研究已相當豐富，可參見如陳學霖：〈徐一夔死刑辨誣兼論明初文字獄史料〉，《中國學人》6，1977年，頁85～96；黃冕堂、劉鋒：《朱元璋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吳晗：〈朱元璋的統治術〉、〈明初的恐怖政治〉、〈明太祖〉，收入《吳晗史學論著選集》（二）、（四），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604～652、665～678、頁89～218；羅冬陽：〈中國古代的極權主義——明初政治

晚年遭遇時有討論。大致而言，宋濂晚年致禍，除了明太祖本身的個性與處事態度外，自己也須負一些責任，這是明代學者所形成的共識。例如李贄在《續藏書》〈卷二 開國名臣 學士浦江宋文憲先生濂〉中有言：

上問公何以不受乞文之饋。公對曰：天朝侍從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予謂公失對矣。公亦不宜待問而後對也。方請文時，公即宜疏列其事，言屬國遣史求文，需奏請天朝，待皇上允許，敕令某臣撰作，乃敢作。臣等既奉勅而後撰文，則日本必不可有所饋而得文也。若受其饋，即為私交。願聖上頒降撰文，而令來使齎還所饋之金，如此，則朝廷尊嚴，小國懷畏，聖上必且大喜也，而公何不知也。予觀上之曲宴公，嘗歎曰，純臣哉爾濂。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嗚呼危哉斯歎！芒刺真若在背，而公又尚不知。何也？已告老而歸，仍請歲歲入朝，欲以醉學士而奉魚水，此亦不過為子孫宗族世世光寵之計耳，愛孫之念太殷也。孫慎，怙勢作威，坐法自累，則公實累之矣。且並累公，則亦公之自累，非孫慎能累公也。使既歸而即杜門作浦江叟，不令一人隸於仕籍，孫輩亦何由而犯法乎？蓋公徒知溫室之樹不可對，而不知殺身之禍固隱于魚水，而不在溫樹也。俗儒亦知止足之戒，徒守古語以為法程，七十餘歲死葬夔峽，哀哉。〔註13〕

李贄用反諷的方式展現明太祖對臣下的專制，雖對宋濂寄予同情，但批評他仍是「俗儒之輩」，甚至不如俗儒，原因在於明知道明太祖個性，卻仍不知變通。李贄以日本使奉勅請文這件事情為例，認為徒讓日本使者獻百金卻不受，不懂選擇一些博取明太祖歡心的變通方式，雖然明太祖一句「純臣哉爾濂。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但李贄卻不認為明太祖滿意這種處理方式。此例雖正面指責宋濂，但也從側面點出明太祖個人專制獨裁的風格。

此外李贄再從宋濂致仕之後仍歲歲入朝之舉，以及後來次子璫、長孫慎皆因胡惟庸案死，累及全家，造成爾後宋濂「謫戍茂州，道卒於夔」的遭遇，認為其根本原因還是出於自身無法洞察政治情勢，沒有管好子孫，也不知進退處世之方。

分析》，《明史研究專刊》12，1998年，頁113～138；林正根：〈論明太祖的心態與功臣群體的覆滅〉，《江漢論壇》1992：12，頁53～60。

〔註13〕〔明〕李贄：《續藏書》，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6年，頁19～21。

明代談遷、朱國禎對宋濂生平，尤其是晚年遭胡惟庸案牽連一事也持類似看法：

朱國禎曰：先生篤行真修，學有本原，文歸爾雅，遭際聖神，大弘制作。守先王之道而見之行，無道學之名而有其實，收宋儒未竟之功，開我明大成之運，決當從祀孔廟。而先生既不自名，世亦無有名之者。汶汶至今，良可嘆息。太祖勞其身以憂天下，切齒于人之不仕者，御製班班可考。先生二十餘年魚水之交，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自其職分，末年引疾，實拂聖心。若有意避遠，並子孫亦杜仕籍，恐天威一振，全族皆沉。欲徙死於夔，其可得哉，俗儒之哀，吾不欲聞矣。

談遷曰：明儒竊宋之理而遺其實，又文萎薊，不足觀也。景濂且英華千古，首闢草昧，館閣之正始也。醉染天毫，夢行睿想，遇合不為不渥矣。一眚株累，頓忘宿昔。素髮垂領，首丘望斷。嗟乎，苟品遇不景濂也者，將百口是盡。悲哉，仕宦真畏途也。〔註14〕

朱國禎肯定宋濂的學行修養，並讚美其雖無道學之名，卻具備道學家的學養，同時肯定他對明朝開國與明太祖實貢獻良多。其次，朱國禎認為他與明太祖相處的時間長達二十年，對於明太祖的行事風格應有相當的體會，文中提到宋濂晚年以疾致仕，「實拂聖心」之舉，因為若有意遠離政治是非圈，不僅是他個人，連子孫都應該杜絕入仕途的念頭，才是避禍的根本方法，否則「恐天威一振，全族皆沉」，此本是宋濂晚年的寫照，故朱國禎於此認為似乎在這一方面宋濂的考慮有欠周詳。

談遷也肯定宋濂的文章與學養，相較於同時期其他文士的遭遇，宋濂與明太祖君臣之間的遇合，實受明太祖的信任與禮遇。但談遷一句「俗儒之哀」與「仕宦真畏途」，提出根本原因在於明太祖的個性造成政治的黑暗，對明初士人遭遇影響甚大的共同看法。《國權》中記載：

（洪武三年六月）壬申。左副將軍李文忠應昌捷至，群臣稱賀。上謂侍御史劉炳曰：若元臣，毋賀。因榜禮部，凡北捷，故元臣不得賀。又以元主達變，諡曰順帝。談遷曰：命故元臣毋賀，于以砥節，至嚴也。諸君子捨彼介麟，依光日月，方濯磨自効，而竟以首陽風

〔註14〕〔明〕談遷著／張宗祥點校：《國權》，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二次印刷，頁602～603。